■ 政德镜鉴㉝

他的人生历程，好似一幕幕悲喜莫名的戏剧：早年血气方刚，抨击弊政不惧构陷；中年扶摇直上，虽有妥协却有底线；晚年与狼共舞，战战兢兢以求保全。心境变迁的背后，折射着权力斗争的残酷、乱世儒者的心酸。

孔光：幸为儒者，哀逢乱世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本报通讯员 梅花 张艳

暑假期间，曲阜小城再度热闹起来。纵使骄阳烈烈，“三孔”景区前依旧人流如织。

游人瞻仰着遗迹，缅怀着古人，在时空交错间寻找古今的关联。

但作为西汉晚期重臣，担任“三公”（丞相、御史大夫、太尉）十七年之久的孔光，虽对孔氏家族贡献颇大，却似乎被人遗忘疏漏了。

“孔光是西汉晚期的大儒、重臣，对孔氏繁盛很有贡献。但他身处外戚得势的年代，虽为政谨慎谦逊，渴望扭转末世危机，却不仅回天无力，还要面临痛苦抉择。”曲阜文史馆馆员、曲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孟继新说。

年少直言敢谏，归隐天下扬名

孔光是含着“金钥匙”降临人间的。他是圣人孔子的第十四世后裔，父亲孔霸则是闻名朝堂的经学大师。

孔霸以传袭今文《尚书》起家，他选择的这条人生路，对儿子孔光有决定性影响。

孔霸痴迷儒家经籍，尤其喜爱今文《尚书》，几乎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。为增长学识，他真诚拜师今文《尚书》的权威学者、西汉太傅夏侯胜。在夏侯胜门下，孔霸研磨典籍，矢志苦学，学问很快趋于大成。

形势的变化，为孔霸出仕提供了有利条件。自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儒家地位愈发显赫，远超其他诸子百家。掌握儒家经籍解释权的传习者也成为朝廷尤其倚重的力量。在西汉中后期，今文《尚书》既是儒家经典读物，也是关系政治风向的行事指南。掌握儒家典籍，不仅是增长学问的途径，而且是跻身仕途的捷径。

因学识渊博、精通《尚书》，又有恩师举荐，孔霸于汉昭帝末年被朝廷任命为博士。汉宣帝即位后，孔霸担任太中大夫，负责议论朝政，很快又开始给皇太子讲解经籍。

在太子东宫，孔霸的教学天赋展露无遗。他不仅教授态度兢兢业业，启发皇子更是循循善诱。皇太子对他服膺有加，引为导师兼益友。

儒家经典的神奇作用，年幼的孔光眨着好奇的眼睛，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

汉元帝继位后，致力于兴复儒学，起用了一批儒学名臣，对老师孔霸尤其念念不忘。他立刻征召孔霸还京，赐其关内侯爵位，再封褒成君，享八百户食邑，奖二百斤黄金，恩宠一时无人可及。

诱人封赏前，孔霸却表现得颇有定力。他看透官场险恶，信服“功成不居”，为人不慕权势，常言：“爵位泰过，何德以堪之？”久而久之，孔霸萌生了归隐的念头。

不久，朝廷“三公”之一的御史大夫出现空缺。先是贡禹病逝，接着薛广德被免，皇帝就想让孔霸接任。孔霸却三次上陈奏折，言辞恳切地请求避让。

孔霸辞官并非装腔作势，而是发自肺腑。元帝探知其意坚定，无奈成全了他的心愿。孔霸去世时，皇帝给予极高的礼遇：两次身穿素服亲往悼念，赐皇家秘器钱帛，赠列侯之礼，谥号“烈君”。

孔霸对仕途的淡泊，对经籍的热爱，深刻影响了孔光的性格。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，年幼的孔光即有深厚的经学造诣。

得益自身才华，也因父亲余荫，孔光未满二十就被举荐为议郎。德高望重的光禄勋匡衡特别赏识孔光，又以贤良方正推荐他，朝廷便擢升其为谏大夫。

仕途的顺遂，让年轻气盛的孔光春风得意，渴望平治天下。对于重臣的昏聩苟且，他严厉抨击，不留情面，渐渐得罪了许多同僚。

不久，孔光遭人构陷，被贬谪到偏远的虹县（今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）任县令。年轻孤傲的孔光愤懑不已，索性辞去官职，径直回乡开馆，做起了乡村先生。

在汉末，“退为进，隐为显”，隐居和出仕关系复杂微妙，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。隐士因为独特的影响力，渐渐成为朝廷征召的重点对象。孔光选择隐居授徒，其实也在等待着时机。

仕途的失意，因教育成绩得到慰藉。孔光遗传了父亲的教学天赋，教书育人成效斐然，弟子陆续成为朝廷博士和官员。终于，在弟子们的推崇下，孔光才名渐渐为天下所知。

谨小慎微避险，傲骨偶有可见

当名气传遍朝堂内外，成为皇帝眼中“遗贤”，为皇家所用也就水到渠成了。

新帝即位后，起初万象更新，许多此前遭受压制的人才有了施展空间。很快，就有大臣举荐孔光出山，由他担任博士。

经过少年的顿挫、岁月的沉淀，孔光已经消磨了许多锐气。他也主动汲取往日教训，收敛昔日锋芒，变得“乖巧”许多。孔光谦卑恭逊对待所有同僚，同事口碑大异于从前。

朝廷派遣的任务，孔光任劳任怨、兢兢业业地完成。他审查冤狱、传布风俗、救济流民，奉行使令，宣称旨意，无不妥帖完善。

此时，博士岗位开始“绩效”考核，根据成绩差异划分三个等级：考核优秀者提拔尚书令，第二等外放监察刺史，最末等补任诸侯太傅。

孔光名列一等第一，顺利出任尚书令。因为原本就精通《尚书》，又研习朝廷典章制度，他很快成为朝廷礼制方面的解释权威。

不久，孔光调任光禄大夫，俸禄为“中二千石”，统领尚书事，成为冉冉升起的一颗政治新星。

官位隆升并未让孔光感到多少宽慰。越是身居高位，越是切身感受到宦海的险恶。西汉晚期外戚权势日重，宦官也开始参与朝政，大臣的地位反而变得卑贱。孔光不善于使用计谋，只能以谨小慎微来躲避中伤。

孔光掌管朝廷机要，历来遵循旧日典章制度，从不逾矩办事。有时皇上提出疑问，孔光都根据经籍记载，用合适措辞答复，从不信口开河。如果皇上不愿听从大臣意见，孔光也不强劝硬阻，只是委婉劝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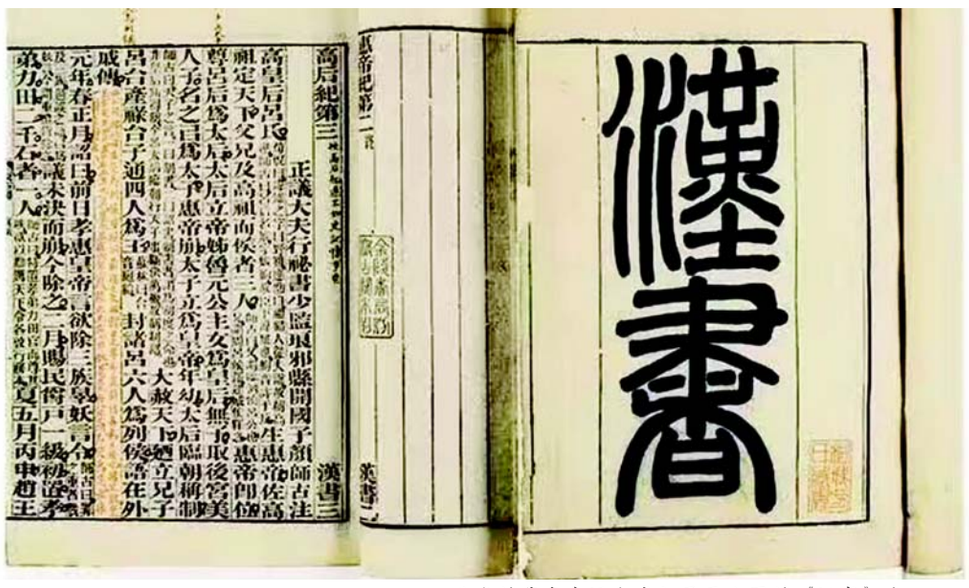
孔光的谨慎小心，体现在朝廷日常具体事务中。他上呈奏折，往往将草稿销毁，不愿他人知晓奏章内容。如果有批评皇帝的言辞，他也只是呈奏皇帝阅览，不令他人获知。孔光常对同僚说：“章主之过，以奸忠直，人臣大罪也。”

即使休沐日归家，与兄弟妻子宴饮谈话，孔光也始终不涉朝省政事。有亲人曾问孔光：“温室省中的树都是些什么树？”孔光先沉默不语，接着以他语作答。

兢兢业业的孔光，逐渐被汉成帝视为心腹重臣。不久，孔光由光禄勋调任御史大夫，成为朝廷“三公”之一。

但孔光的谨慎，并不意味着他趋炎附势，丧失内心原则，没有傲骨只有媚骨。

很快，在皇帝继承人这种重大问题上，孔光竟然不愿察言观色、附和他人，而是始终不渝地维持礼制权威，情愿为此付出沉重代价。



孔光的悲喜命运大多记录于班固的《汉书》中

坚持己见获谴，公正审案见信

汉成帝虽然妻妾众多，却蹊跷得始终膝下无子。到了绥和初年（公元前8年），这个问题演化为妨碍汉帝国传承的重大困扰。

此时，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，是年过四旬的中年人。他的健康已经出现问题，众人对他诞下后代大多不抱多少希望。而在医疗条件落后的西汉，成帝随时可能撒手人寰，国家储君有无变得愈发重要。

严峻形势下，为了断绝部分诸侯王的窥伺，继承人人选虽然起先被羞羞答答掩饰起来，如今必须要摆上台面进行一番讨论。

成帝的至亲比较简单：同胞弟弟中山孝王，以及胞弟之子定陶王。两王辈分不同，选谁为帝取决于人伦的考量。

定陶王年纪较轻，且好学多才，在朝臣中颇得好评。但他的亲属家族，却有极强的政治野心和强硬的政治手腕。祖母傅太后经常派人精心侍奉皇后赵飞燕、宠姬赵昭仪和帝舅大司马王根。这些人因为享受了殷勤款待，自然投桃报李，多番称赞定陶王，劝皇帝立其为嗣。

成帝本就缺乏主见，面对承载整个帝国命运的大事，更是犹犹豫豫，始终拿不定主意。他决定集思广益，借鉴大臣的意见。他召集王根、翟方进、孔光，右将军廉褒，后将军朱博等人，让他们公开评议中山、定陶二王优劣。

翟方进、王根抢先表态，认为定陶王乃成帝胞弟之子，更适合立为后嗣。因为按照《礼记》规定，“昆弟之子犹子也”“为其后者为之子也”。

廉褒、朱博随即附和翟方进、王根。只有孔光坚持认为应按《尚书》礼制确立后嗣。中山王是先帝之子，当今皇帝亲弟，地位优隆，骨肉至亲，无人可比。而《尚书·盘庚》中即说殷王无嗣，立其弟继承王位。如今皇帝没有子嗣，以中山王为后更为合适。

皇上最终听从了多数派意见。他找到了一个理由说服自己：《礼记》规定，兄弟无法同时进入祖庙。立定陶王作为太子，能解决这个问题。

一向谨小慎微的孔光，这次出人意料坚持己见。这和他作为儒学名臣，矢志维护《尚书》权威密不可分。

这次“犯颜直谏”，让孔光付出了沉重代价。很快，孔光因“议不中意”，由御史大夫贬谪为廷尉。

但孔光没有就此沉沦，他似乎毫不在意权势的丧失。在新岗位上，他继续发光发热，干得有声有色。此前，孔光担任过尚书令，非常熟悉朝廷法令条例。现在负责案件审讯，他更是驾轻就熟。即使处理复杂的案件细节，也得心应手，以理服人，赢得“周密公平”的赞誉。

不久，成帝为了考察孔光，扔给他一块“烫手山芋”。

当时定陵侯淳于长被人揭发，承认了自己“谋废许皇后”的罪名。成帝闻讯大怒，令大臣严厉审讯，务必穷究其行。

案发之前，淳于长有六名妻妾被休弃，有的甚至已经改嫁他人。如何处理这些妻妾，成了大臣争论的焦点。

丞相翟方进、大司空何武认为，“犯法者各按犯法之时律令事论之”，主张予以连坐处理，“与自身犯法无异”。

孔光则不认可这种意见。他认为，夫妇之道不同血缘亲子，属于“有义则合，无义则离”的社会关系。淳于长犯罪之前，六名妻妾已经离异，社会关系已经消失。如果贸然判决死罪，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。

双方的意见都呈递给了皇帝。这次，成帝站在了孔光这边，采纳了他的看法。后来右将军廉褒、后将军朱博因牵涉淳于长案被贬为庶人。成帝就把孔光擢升为左将军。

数月后，丞相翟方进病故。成帝令人召来孔光，想要任命他为丞相。当时封侯书印都刻好了，不巧成帝却突然死亡。于是就在成帝灵柩面前，孔光受命为丞相，封博山侯。

孔光虽然位登宰辅，裂土封侯，但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自己反对迎立的定陶王即位，孔光将背负“贰心”的原罪。纵使他竭力维持两人微妙的关系，但灾难还是如期降临。

有心改革振作，无力抗衡皇权

哀帝即位之初，和孔光的关系还较为融洽。哀帝在孔光建议下躬行俭约、省减诸用，政事更新，朝廷明显有了精气神。

在哀帝“励精图治”的支持下，孔光开始对汉末弊政改革。他奏请减少乐府乐工，哀帝一次性裁撤四百一十四位乐工。

接着，孔光又奏请对豪强地主的田产和奴婢予以限制，防止土地兼并进一步恶化。

西汉末年，地方豪强势力越来越庞大，他们利用优势的政治经济地位，“多畜奴婢，田宅亡（无）限，与民争利”，导致“百姓失职，重困不足”。

在得到哀帝支持后，孔光草拟了“限田限奴”的具体政策：“诸王、列侯……公主，皆无得过三十顷。诸侯王奴婢二百人，列侯、公主百人，关内侯、吏民三十人……”如果超出这个标准，“诸田、畜、奴婢皆没入县官”。而且改革措施还涉及宫廷人员，要求“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，出嫁之，官奴婢五十以上，免为庶人”。

为了反对奢靡，提倡节俭，孔光还规定“郡国无得献名兽”，试图阻断地方搜刮百姓以邀功请赏的途径。

改革措施一公布，就遭到了无数权贵的攻击。一向谨慎的孔光霎时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众矢之的。

其中，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家族反对的声浪最为强烈。早先傅太后住在定陶国邸，哀帝即位后想将她迎至京城居住。对于太后安置在哪所宫殿，孔光发表了不同意见。

孔光知道傅太后为人刚暴，又长于权谋，对哀帝影响力极大。他建议傅太后住在比较偏远的宫殿，防止她和皇帝过于亲近，日后干预朝政。但大司空何武却说：“（太后）可居北宫。”哀帝采纳了何武的建议。此事传到傅太后耳中，自然对孔光恨之入骨。

北宫外有一条小径直通皇帝居住的未央宫。傅太后自此频繁出入哀帝居所，请求“太皇太后”的尊号，并要皇帝加封她的亲族。

不久，“傅迁事件”让孔光和傅太后更是势同水火。太后侄傅迁因屡次犯法，被哀帝免官发送原籍，诏书也颁发到了各处。但因为傅太后发怒，哀帝又将诏令收回。孔光为此上了一封语气强硬的奏折，直接批评哀帝前后不一的态度：“诏书‘侍中、驸马都尉（傅）迁巧佞无义，漏泄不忠，国之贼也，免归故郡。’复有诏止。天下疑惑，无所取信，亏损圣德，诚不小愆。”

孔光还表示，近期因为灾异频现，皇帝迁居旁殿，每见群臣都思求其故。为今之计，应该将（傅）迁送归故郡，以消弭上天的警示。但哀帝迫于傅太后权势，最终还是将傅迁留在了都城。

傅太后成功影响皇帝后，攫取权势的野心日益膨胀。她希望能享受同成帝母相同待遇，群臣因畏惧都顺其意愿，表示母以子贵，宜立尊号。

朝廷之中，只有孔光与大司马师丹认为不可如此。很快，师丹因罪被免，孔光也即将难以自保。孔光知道，在先帝议嗣时自己反对立哀帝，又屡次忤逆傅太后意愿，遭遇构陷是迟早的事。很快，傅氏家族与继任司空朱博内外勾结，一同诋毁孔光。

在他们的提示下，哀帝想起了孔光议嗣时的态度，便罢免他的官职。在免官诏书中，哀帝先强调丞相地位和职责之重要，“朕之股肱，所与共承宗庙，统理海内，辅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”。而如今天下灾异不断，正是“股肱之不良也”，即孔光做得不称职。接着，皇帝开始大翻旧账，数落孔光的种种不是：前为御史大夫，“辅翼先帝，出入八年，卒无忠言嘉谋”。如今担任丞相，“出入三年，忧国之风复无闻焉”。

哀帝还将天下积弊悉数推给了孔光。如“阴阳错谬，岁比不登，天下空虚，百姓饥馑，父子分散，流离道路，以十万数”，再如“百官群职旷废，奸轨放纵，盗贼并起，或攻官寺，杀长吏”，这都是孔光不作为造成的。哀帝“痛心疾首”表示：“数以问君，君无怵惕忧惧之意，对毋能为。”在皇帝眼中，孔光的“不作为”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：“群卿大夫咸惰哉莫以为意”。

诏书最后，哀帝愤慨道：“君秉社稷之重，总百僚之任，上无以匡朕之阙，下不能绥安百姓”。他命令孔光上交丞相、博山侯的印绶，罢归故里。

哀帝下发此道诏令，半出于对孔光的介怀，半因为傅太后的胁迫。等到风头过去，他立刻想起了孔光的好。

暮年与狼共舞，忧惧只求保全

孔光退归乡间后，不再参与政事，也不抛头露面，只是杜门自守。数月之后，丞相朱博因附和傅太后妄奏大臣，被皇帝发觉而畏罪自杀。此后一年间，朝廷一连换了三任丞相，却总也无法让哀帝满意。

次年正月初一，长安出现日食，这在谶纬之学盛行的汉末，绝对是件人心惶惶的大事。不久，灾异果然降临，十余天后傅太后驾崩，朝堂笼罩在恐慌情绪中。

几天后，哀帝想起了博学的孔光。他派出公车紧急征召，向孔光咨询日食缘故，询问消解对策。

孔光借着这次机会，详细阐发了自己对朝政的见解，对皇帝提出了一系列建议，“敕躬自约，总正万事，放远谗说之党，援纳断断之介，退去贪残之徒，进用贤良之吏，平刑罚，薄赋敛，恩泽加于百姓，诚为政之大本，应变之至务也。天下幸甚”。孔光认为，如果皇帝能践行自己陈述的政策，定能“应天塞异，销祸兴福”。

奏折呈递后，哀帝大喜，赐孔光束帛，拜为光禄大夫，位次丞相。

月余之后，丞相王嘉下狱身死，御史大夫贾延又被免职。孔光当月就复为御史大夫，二月又为丞相，还复故国博山侯。哀帝还罢免曾诬陷孔光的大臣傅嘉，谴责他“前为侍中，毁谮仁贤，诬诉大臣，令俊艾者久失其位”。

第二年，孔光担任大司徒。正当他摩拳擦掌准备有所作为之际，年轻的哀帝突然驾崩。因其无子，太皇太后立中山王为帝，以外戚王莽为大司马辅政。

新帝年幼无知，委政于王莽。哀帝为了加强君主权力，曾削弱外戚势力，罢黜成帝母亲王氏家族。如今王氏重新当政，大肆废弃哀帝此前的政策。

重新掌权的王莽，极其害怕权力的再度失去，便想方设法打击政敌。他认为孔光为旧相名儒，深受天下信赖，又得到太后的敬重，是代替自己出手的绝佳人选。

孔光的暮年岁月，就这样被迫和王莽捆绑在了一起。

对王莽的刻意殷勤，孔光有所察觉，并敬而远之。但王莽先疏通太皇太后关系，让她下令孔光上奏弹劾大臣。孔光无奈，只得奉命而行。王莽此招屡试不爽，以致“睚眦莫不诛伤”，反对势力很快销声匿迹，王莽权势日益显赫，孔光与狼共舞，内心忧惧彷徨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无计可施之下，孔光想到了先祖“邦无道则隐”的训诫，上书乞骸骨回乡。王莽却对太后表示：“帝幼少，宜置师傅。”孔光随即被任命为太傅，不久又徙为太师，依然要和王莽同朝为官。

王莽此时担任太傅，孔光为了不和他碰面，总是称疾不上朝。后来王莽唆使群臣称颂自己的功德，并上尊号“宰衡”（商朝名臣伊尹为阿衡，西周名臣周公为太宰）。“宰衡”地位超出“三公”和诸侯王，可以统领朝廷百官。孔光见状愈加惊恐，一再称疾辞位，不愿跻身浑浊的官场。

孔光的辞职奏折接连呈递，太皇太后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。

元始五年（公元5年），70岁的孔光病故。他终于得到解脱，不需在坚守内心和趋炎附势间痛苦挣扎。

孔光病故三年后，王莽篡汉自立。不久，天下大乱。又十五年，农民军攻入长安，王莽被杀。

孔光像

·相关阅读·

西汉时期，外戚显示出强大的政治影响力。他们往往辅佐帝王争夺、控制权力，却也在权力盛宴中自肥。外戚势力不断膨胀，终于成为对皇权的主要威胁，以致王莽篡汉取而代之。

外戚参政：相伴皇权的蜜糖毒药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
西汉晚期重臣孔光的仕途生涯，往往伴随着外戚的兴衰成败。得到外戚支持时，孔光的施政和改革往往能顺利成行。受到外戚反对，改革措施不仅中道停止，孔光本人往往也被罢职免官。而西汉灭亡前夕，外戚集大成者王莽当政时，孔光甚至成了他打击其他政敌的锐器。可以说，外戚对西汉晚期的政治局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。

外戚依附皇权而生。自秦始皇废分封、立郡县开始，“封建制一变为中央集权制，贵族制一变为官僚制”，血缘主义向实力主义倾斜。但作为依附皇权血缘的残余，外戚在两汉依旧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力。

早在汉初，外戚就开始进入政坛。吕后大力提拔亲族，吕氏家族的影响力不断扩大。后来的汉文、景、武三帝时期，窦氏、王氏、卫氏三大外戚都是朝中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。

到了昭宣时期，外戚势力迅速发展，已经掌握朝廷大权，开始主宰政局。只是昭宣二帝尚属英明，仅利用外戚辅政，巩固自身权力，但依旧对外戚有所节制。当外戚专权威胁皇权后，他们往往等待时机成熟，起而反攻，消灭外戚，夺回政权。例如这一时期外戚典型代表霍光，在汉武帝驾崩后以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政。

在辅政期间，不但政事一决于霍光，就连皇帝废立都由其决定。他在昭帝死后，废掉自己不满意的昌邑王，改立没有多少羽翼的宣帝。

宣帝即位后，因自身势力孤弱，被迫委政于霍光。当时霍光是辅政之臣，而霍氏一门也身居高位，执掌大权。其外孙女是昭帝皇后，小女儿又是宣帝皇后，另两个女婿是东四宫卫尉，昆弟诸婿外孙皆为诸曹大夫、骑都尉、给事中。霍氏在朝廷盘根错节，形成了庞大复杂的权力网，甚至威胁到皇权的安危。《汉书》称霍氏“党亲连体，根据于朝廷”。霍光“每朝见，上虚己敛容，礼下之已甚”。

外戚权力的加大，引起了宣帝的忧虑，“（宣帝）谒见高庙，大将（霍）光从骖乘，上内严惮之，若有芒刺在背”。只是在当时，宣帝对霍光还有顾忌，不敢公开表露。等到霍光一死，宣帝立即对霍氏发动反击，剥夺霍家权力。后来更借霍禹谋反一事，一举诛灭霍氏。此后宣帝终于大权独揽，因而“车骑将军张安世代（霍）光骖乘”，宣帝才得以“从容肆体，甚安近焉”。

但皇权能否安固，往往取决于皇帝个人的能力。随着宣帝故去，外戚势力卷土重来。元成哀平四帝时期，是外戚势力膨胀的重要时期。

元帝因不善理政，权力与皇后王政君分享。此后的皇帝或年幼或懦弱，根本无法单独处理政事。王政君得以先后凭借太后和太皇太后身份执掌政权近50年。

在当政期间，王政君大肆提拔自己的本族亲戚。成帝即位后尊王皇后为太后，以王凤为“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，封五千户”。而王氏之兴也自（王）凤始。后来朝廷又封“舅（王）谭为平阿侯，（王）商成都侯，（王）立红阳侯，（王）根曲阳侯，逢时高平侯，五人同日封，故世谓五侯”。她的侄子王莽先后封大司马、安汉公、宰衡，居摄政地位。

当时王氏子弟“分据势官，满朝廷……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”。只要王氏开口，连皇上也不得不听。成帝欲封学者刘歆，王凤以为不可，“乃止，其见惮如此”。

只有哀帝继位后，抑制王氏权力。但他所倚重的，还是自己的外戚傅家和丁家。但随着哀帝早亡，王氏趁机发动政变，重新夺得了权力。

新立的平帝年仅9岁，懦弱无知。王政君此时也年老昏聩，政事全被王莽所控制。平帝14岁病故，王莽“恶其（嗣皇位者）长大”而不好控制，又立宣帝玄孙年仅两岁的刘婴为帝。这样，实际由王莽行使皇帝实权。王家势力的长期显赫，为王莽代汉奠定了政治基础，终于在公元8年，王莽一脚踢开名义上的皇帝，自立为新朝皇帝。对于王莽的篡权，清代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说：“成帝柔仁，专任王氏，而国祚遂移。”